


曲青山 高永中 主编

抗日 战争

回忆录


3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抗日战争回忆录

3

曲青山 高永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目 录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田 方	1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傅英豪	8
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阳翰笙	14
在抗敌剧社的日子里	白 林	38
华中的抗日革命熔炉	洪学智 薛暮桥 谢云晖	44
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谢云晖 胡 明 王子畊 林 晖	68
回忆《挺进报》	谢中峰 齐 光 马 焰	81
我做八路军情报工作的岁月	林 一	87
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	钟子云	92
回顾新四军的整风运动 钟期光 张 凯 张崇文 汪大漠 刘志诚		97
粉碎日军“铁壁合围”	罗文坊	106
回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一段斗争	杨成武	118
饥饮刀尖霜, 困在雪地眠 ——坚持“无人区”的几则故事	王定国	132
惨绝人寰的长城“无人区”	李运昌	139
战斗在狼牙山	葛振林	147
沂蒙军民反“扫荡”	梁必业	152
战牙山	许世友	160
变伪化区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余纪一	165

山子头自卫反击战	韦国清	172
塞北抗日回顾	高克林	183
甄家庄歼灭战	周士第	196
从山东到太行	肖 华	202
雁翎队里的日日夜夜	张 杰	215
“皇军观战团”的覆灭	林克夫	223
攻克八滩 全歼山本中队	谢振华	227
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金 城	231
难忘的1945年	李 新	246
用胜利迎接大反攻		
——记1945年冀中我军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作战	李 健	267
忆两淮战役	黄克诚	273
阜宁战役	洪学智	279
转战淮南淮北	成 钧 赵启民	293
回忆兴化盐城之战	管文蔚 姬鹏飞 张 藩	308
收复张家口	段苏权	319
同苏军一道解放东北	王明贵	327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彭施鲁	330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肖 锋	342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胡炳云	347
巾幗英杰		
——忆赵一曼同志	韩光	354
忆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		
..... 李登瀛 刘华香 屈健 谷奇峰 石磊		361
白求恩在华北抗日前线	叶青山	373
忆柯棣华	江一真	383
一个外国八路军		
——回忆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医生	刘洪德	392
美军观察员多兰上尉在一次惊险的地道战中	高存信	401
和八路军在一起生活的几年		
..... [日] 稗田宪太郎 陈信生译 王明仁校译		408
华丰受降	冯少白	427
东京审判亲历记	倪征燠口述 宗道一等整理	431
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	徐其富 迟生 董家义	450
后记		458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田 方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我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封闭。我经组织介绍，从重庆经洛阳和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于8月间辗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当年5月创刊的《解放日报》，担任采访通讯科编辑兼记者。报社地址在清凉山，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余光生。当时，采通科不到10人，科长是郁文，后来他调到《晋绥日报》担任领导，便由杨永直继任科长。我在采通科以编辑工作为主，除处理通讯员来稿外，兼作采访工作。那时，县、区、乡通讯员很少。夏天，洪水暴涨，延河水位上升，南关外通讯站的邮递员不能过河投递邮件，冬天，冰雪封山，交通邮递受阻。每到这时，我们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便要出去采访。我们沿着延河的东岸和北岸，往北经王家坪到杨家岭；往东经飞机场到桥儿沟、柳树店一带去采访机关学校有关学习、生产的动态新闻。有时，一个记者一天要写五六条新闻，才能填满“边区版”的篇幅。由于报社无人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会议，又没有基层通讯员，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很难知道，所以很难写出受读者欢迎的好稿子。

当时，在延安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外，还有《边区群众报》。此外，延安以外各专区的地委也大都有机关报，如绥德专区的《抗战报》、三边区的《三边报》、陇东专区的《陇东报》、关中专区的《关中报》等，延属专区因为已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所以没有办报。各专区的报纸除《抗战报》

是铅印的以外，其他都是油印或石印的四开小报。由于稿源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也从专区报纸上选录一些重要的新闻在《解放日报》上转载。

我从1941年8月起一直在边区从事新闻工作，直到1949年6月由担任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社长任上调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为止，前后历时八年，亲身经历了《解放日报》社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事件。

1942年，我党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月1日《解放日报》的宣告改版，也可以说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历史作用的直接体现。

一、《解放日报》为什么要改版？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对报社以往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社论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社论最后特别检讨说：“对于边区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全面的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社论列举的这些缺点，具体表现在当时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即：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却只占四版的上半版，下半版则是副刊。任何重大新闻报道，一律按上述安排“对号入座”，就连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报告的新闻，也只能在三版左下角一隅。所以，整风学习一开始，读者对《解放日报》就提了很多批评和建议。他们批评报纸“立论空泛”，“同日常工作与生活联系太少”等等；希望报纸今后能“密切联系边区建设的实际”，“帮助解答每天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党中央根据毛主席于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也一再指示《解放日报》，要克服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观主义作风。据此，《解放日报》编辑部多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报纸改版方案，又在《致读者》的社论中，宣告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开始。

改版首先要解决的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如何实现？在《解放日

报》改版当天发表的《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致读者》的社论中，在《解放日报》于这年9月发表的《党与党报》的社论，于1944年2月发表的《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以及其他几篇社论中，先后明确提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在《致读者》这篇社论中，还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党报所必须的品质”为：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要密切与群众联系；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这就明确提出了以党性原则为首的办报方针。《解放日报》并根据毛主席于1942年3月在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指示，通过一篇题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的社论，直接向各部门的干部和党员提出了要求：“请你们也记着，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这也是你们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大家来动手动脚，我们的报纸才能办得更好”。

1942年9月，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为此发出了《加强〈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解放日报》也配合这一决定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着重从党的领导的角度谈了帮助党报的问题，强调指出：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编辑、记者的意见和兴趣办报，“那就一定党性不纯，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1945年5月，《解放日报》在《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的社论中再次强调：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是报纸的作风”，“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党的报纸所必须具有的本质。

二、《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新气象

《解放日报》改版第一天的头版头条，登载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关于减征公粮4万石，公草1000万斤的决定。这件关系全边区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整个版面作了调整，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即：一版，以解放区消息为主的主要版；二版，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国际消息版；四版，综合副刊版。这样，大大扩充了报道

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改版两年后,《解放日报》编委会又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版面的计划:一版,要闻及战况;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国内消息和副刊;四版,国际新闻。这两次调整版面绝非一般技术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报》编辑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它使报纸的报道同客观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特别是第二次版面调整时,恰值延安整风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于是,《解放日报》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英雄模范事迹和劳动竞赛情况的报道,这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日报》所发文章也逐步树立起新的文风,对废除党八股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同时,《解放日报》还下大力抓了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报纸改版后不久,博古在一次报社编委会议上,谈到通讯员工作时提出:今后这项工作从批稿子,看卷子转到组织工作方面去,《解放日报》随后也发表了《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论述了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能有干的编辑和优秀的记者,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陆定一也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章,指出: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广大通讯员相结合,“是《解放日报》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我们就可以办出一张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为了培养通讯员和记者,报社除通过所发社论和文章进行思想指导外,还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编了《新闻通讯》专刊,以加强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这就使《解放日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了报纸和实际以及和群众的联系。

1942年9月,《解放日报》社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我们采通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了近10位同志担任记者,部主任相继由缪海稜、丁浩川担任,以后还从地方上调来担任党政领导的裴孟飞当部主任。报社还先后在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设立了常驻通讯处。一批青年记者被派往各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我和另两位同志被派到绥德分区。行前,社长博古和我们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

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这是你们下乡工作的任务之一。

接着，博古又讲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说：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我们也要反对庸俗化的通俗。

博古特别强调地讲了培养地方通讯员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

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

最后，他再三叮嘱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博古接见后，“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了我们响亮的口号。不久，我们满怀激情告别了延安，分赴各个专区去了。

三、报纸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2年9月底，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绥德，直到1946年调回延安。在三年多时间里，我在绥德专区各县农村和通讯员一起，对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劳模人物、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移民运动、文化教育、保卫边区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同许多通讯员、农民交了朋友，学习了许多活的知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对报纸宣传工作很关心，经常了解我们通讯处的工作情况，帮助通

讯处解决具体问题，让我们参加地委有关会议；最使我难忘的是1943年四五月间，我参加了习仲勋带领的一个调查组，去绥德县郝家桥调查。调查组的成员还有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宣传干事梅行等同志。下去之前，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学习，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认识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之后，我们遵照这一精神，到郝家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围绕大生产运动这个中心，根据绥德地区人多地少的特点，调查了移民运动、组织变工队以及锄草、夏收中的农作物和劳动力组织等问题。调查方式灵活多样，有分有合，有时和农民一起劳动，边干边谈。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就是在调查中发现的，是郝家桥群众在一次由习仲勋同志主持的调查座谈会上把他推举出来的。就这样刘玉厚的名字很快从郝家桥、绥德县、全专区以致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我除了结合农时报道了刘玉厚和郝家桥的模范事迹外，还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和《刘玉厚的光辉》等通讯。

关于移民问题的调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延安以南地区人少地多，而绥德地区则是人多地少。为了合理调剂劳动力，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陕北群众素有“下南路”的历史习惯，发动组织开展移民运动。历史上陕北一般的雇农、赤贫者常因没有土地、无法生存，只得下南路去开荒种地。边区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农民生活相应地得到了改善，但广大贫农的生产力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生活还相当艰苦。所以，经过边区政府的鼓动和奖励，经过各级干部的具体组织，广大贫农响应政府号召，向南路进军，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荒地。为了在整个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开荒运动，我们就移民对象，他们在生活、生产上可能和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周密的调查。经过调查，了解到贫农中，唯有下贫农劳动终年，解决不了全家吃粮问题。对他们来说下南路移民是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生活的最好出路。在明确了移民的主要对象后，我们还明确了需要帮助他们筹划路费，准备口粮和衣被等等问题。就在从郝家桥调查结束回到绥德后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关于在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勋审阅，得到了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与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米脂县开展移民工作等新闻报道和《马丕恩在召唤》等通讯。1944年春，佳县李增正率领的移民大队，扛着红旗，唱着《东方红》民歌，路经绥德去延安。绥德专署杨和亭副专员专门主持了热烈的迎

送晚会，移民们即席编唱了多首陕北民歌。我当时兼任地委《抗战报》的主编，参加了这次晚会，并请记者陈柏林采写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讯，详细介绍了《东方红》的全部歌词，发表在《抗战报》上。歌词内容含有陕北农民朴素的感恩思想，在当时更是真实地唱出了陕北农民的心里话。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六七年。1947年保卫延安自卫战争开始时，我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派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随军记者，从此，告别了延安。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傅英豪

8

1940年的一个秋夜。

从那一排排错落不齐的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愈来愈稀少了，延安度过了紧张的一天后渐渐地进入了睡乡。可是就在这时，王皮湾的一孔石窑洞里，通信兵的战士们正围着一部机器进行着最后一次试验。汗水从同志们的额角渗出来，就像窑洞石壁上的水珠一样，在煤油灯光下晶晶闪闪。片刻，人们轻轻地吁口气，立起身来，只听得电源组组长苟在尚同志说了一声“开动”，机器立刻呜呜地转动起来。同志们几乎是同声呼叫着：“行啦！”几个月来我们焦急地期待着的发电设备终于装制成功了。明天，它将为我们的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开始供电了，大家的情绪随着机器的转动欢腾起来。

我们党虽然早就有了用无线电报发出的文字广播，但是还不曾有过语言广播，因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语言广播电台的建设。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养病回来时，克服了运输中的各种困难，带回了苏联援助的一部无线电广播机。于是，这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安装任务就交给了我们。

我们这群工作人员中，无论是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或者是久经征战的红军战士，谁都没有安装广播电台的经验。但是同志们却有一片雄心壮志，接受到这个任务，人人都兴奋异常，立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使这部机器迅速发音，让党的声音传遍四方。”

要让电台发音，首先就要解决动力问题。这时延安正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层层

包围和封锁中，根本不可能得到一部现成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只好要来了一部坏汽车头，边拆修边学习，用它改造成了电台所需要的发动机。没有汽油做燃料，同志们就用木炭产生煤气来代替。木炭怎样烧才能得到需要的煤气，煤气又怎样使汽车头发动起来，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全是新问题。但是依靠党的领导和集体的智慧，终于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决了。

面对着已经调整好的广播机，我的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起了来延安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的不是露骨的反动宣传，就是麻醉人民革命斗志的靡靡之音。我们几个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不知发过多少感慨：“什么时候，一扭开收音机，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就好了！”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从今后，我们这部红色电台，将成为新华文字广播电台的一个兄弟，它们将相互配合在一起，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播根据地内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实况。不管日军和国民党有多大的本领，挖多少封锁沟，筑多少封锁墙，他们都无法阻止我们的红色电波飞出延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志们就起了床，喧嚷嚷嚷，像准备参加什么庆典似的。从同志们一双双发红的眼睛里可以看出，这一夜同志们和我一样，兴奋得没有好好入睡。广播员徐瑞璋和姚雯很早就来到播音室，再一次收拾那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播音室，是一孔新挖好的土窑洞，一走进去还可以嗅到新土的芳香；拱形的窑洞内壁和门口挂着深灰色的军毯（这是当时边区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羊毛毯），用来隔绝从远处传来的鸡鸣犬吠和消除洞内的回音。窑洞里只放着一张白木桌子和一条板凳，桌上的麦克风虽然很旧，但被擦得一尘不染。

吃过早饭，文字广播电台报务主任汤汉璋同志带着极大的兴奋来到播音室门前。他特地穿了一套干净整齐的灰军服，背上背着一部自己装制的小型无线电话机，大块的干电池把军装下方的大口袋挤得鼓鼓的，俨然一个就要开赴火线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他这是为了及时知道试播的效果被派出去收听情况的。当他那精神抖擞的背影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电台开始了试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广播员反复呼叫着，然后用洪亮悦耳的声音读着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我们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收听者发回的报告。

“我在裴庄，声音很好。”突然传来了老汤的声音。

声音传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隔不多久，又听到了老汤从无线电话机里传来了洪亮的声音：“我已到枣园附近啦！声音清楚得很！”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老汤的那副高兴劲儿。我们在电台上的人一听到枣园这两个字，个个喜形于色，因为枣园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常来住的地方啊！“要是毛主席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一定会听到我们的播音呢！”有人竟在麦克风旁边轻轻地说出声来。我心里激动地想，等我们试播全部成功后，说不定还能请毛主席到电上来向各个根据地的军民、向全国人民讲话哩！

老汤离开广播电台愈来愈远，而我们的播音他始终都听得很清楚。当天从安寨那边传来消息说，那边也用收音机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

我们向各个根据地搜集反映。打电报问离延安较近的晋西北各电台，想不到那里的回电说没听到，有的电台说只偶尔听到一两个字，很不清楚。大家多么希望无线电波像一根根从延安射出的红线，把党中央以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同各个根据地的军民紧紧地联在一起。调配组的唐旦等同志和我反复检查了机器和天线，把我们认为可能造成的收听障碍全都消除了，各个根据地回电说仍然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试播工作就这样被卡住了。

大家的心情开始焦急起来，就连一向爱唱爱跳、性情非常活泼的广播员小徐和小姚也突然变得沉闷了。一年前，这两个江苏姑娘像许许多多的青年一样，怀着极大的热情奔来延安。她们原希望到前线去做宣传员的，延大毕业后，却被留下做了广播员。她们知道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很愉快地接受了。而且觉得，凭着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清楚流利的口齿，也一定能够在人民广播事业中做出一番成绩来。她们在试播工作中是那么认真，一篇稿子播送前总要经过反复的揣摩和预播，生怕表达不出原稿的感情。在业余时间，除了参加种地、纺线等劳动以外，一有空就钻研业务；为了矫正某些汉字的发音，电台上仅有的那本小字典快要被她们翻烂了。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广播来，广播去，各根据地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辛勤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她们更是十分心焦。

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一直关心着试播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发同志曾专门到电台来视察，他鼓励我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不要乱闯盲干，要发挥集体的智慧，根据科学道理逐步进行试验。我们根据电波传播的理论，意识到问题的产生可能和电波的波长选用不当有关。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波长才能克服某些地方

收听不到的障碍呢？文字广播电台的同志们说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把这部语言广播电台调到文字广播电台所用的波长上拍发新闻电报，看看各根据地新华分社的电台能不能听到。试验的结果，各个根据地的电台都给了回电，说听得和往常一样好。我们就进一步在这个波长上进行语言试播。

这天，我亲自在广播机旁掌握机器的调整，让汤汉璋同志在报房里守着收报机，及时收听各根据地的反映。这时大家仿佛成了等候发榜的考生，既感到有一定的把握，又担心可能遭到意外的失败，心情非常紧张。一会儿，我身旁的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汤汉璋同志激动而有点不连贯的声音，第一句就是“队长，问题解决啦！”接着他告诉我，晋察冀、晋东南、山东、晋西北都先后发来电报，说广播的音质清晰、音量良好。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喜得跳起来。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现在终于结出了果实。从这回试验中，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集体智慧的巨大力量。

我们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从此开始了每天定时的试播。在试播中，我们不但播送新闻和报纸上的重要文章，而且还播送“文艺节目”。一开始电台上连一部唱机都没有，所谓文艺节目，常常就是广播对着麦克风唱几只流行的革命歌曲。不久，弄到了一部破破烂烂的手摇式唱机。但因为边区没有条件制唱片，而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片子内容健康的又不多，所以放来放去，总是“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片子。后来，我们便请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来播送“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他们的大队人马一来，常把小小的窑洞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使电台能早日正式播音，通信战士们在接踵而来的多种技术问题上刻苦地钻研着。女调配员徐路同志在窑洞里长时间值班，被发动机煤气管漏出来的煤气熏倒了。等到同志们把她抬到窑洞外救醒，她又立刻跑回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进行未完成的试验。后来当机器上某个重要的电子管失效而又没有备用品更换的时候，我们在党和上级的鼓励下，又拆掉原机器的部分结构，重新改装，终于利用了手头现有的电子管使电台继续工作。

1941年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新华社的通讯员骑马来到电台，送来了当天的广播稿。从通讯员紧张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今天准有重要的文章需要广播。打开稿件，我的眼前跳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行大字。这是党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的重要谈话啊！我立刻打电话给广播员，告诉她们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文件要播，同时贪婪地读起来。几天以

前，我们在报纸上就读到了国民党亲日派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的消息。看了这篇谈话对于日军和国民党亲日派丑恶面目的揭露，就更加使我义愤填膺；而当读到谈话对于国内外进步力量的精辟分析的时候，我又对于阻止敌人阴谋的实现增加了百倍信心。我放下稿件，思绪又回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大后方”。那里的各种反动宣传机器，一定配合着这次反共事变，对我党我军极尽造谣污蔑的能事。可是今天，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通讯社、报纸，而且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广播电台，对敌人反动宣传予以有力的回击了。

我把广播稿件交给了小徐和小姚。她们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了，早早地进了播音室，点上小油灯，轻轻地放下了挂在窑洞门口的毛毯，然后走到麦克风前，静静地坐在那里。当播音时间一到，小徐打开麦克风开关，作了几分钟的呼叫以后，开始播送毛主席亲自起草的那篇谈话。为了使真理的声音传播更广，小徐播完一遍后，小姚又再播一遍。在整个广播过程中，她们几乎拼出了全身的力量，使每一个字音都深深地印入听众的心里。你听，她们播出了对国民党亲日派的严重警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那种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的语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冬天夜晚的窑洞是寒冷的，可是这两位姑娘在播音机前竟汗流满面。当她们从窑洞里走出来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的感情从她们的脸上流露出来。是啊，这正是另一条战线上的胜利啊！

完成这次播音之后，我们更深深感到，自己是战斗在一个光荣而极为重要的岗位上。各个根据地，经常以各种方式，把收听的效果告诉我们，从各方面鼓舞着我们。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一天，突然接到从国民党统治区邮来的一封信，署名是昆明学联。信上说，昆明的进步青年常常偷听延安的广播，从广播中，他们知道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许多英勇斗争的事迹，知道了边区人民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知道了延安正在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一切都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对革命的了解，产生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我们红色广播电台播送了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形，而这是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所绝对做不到的。这封热情洋溢的远方来信，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正如电台工作人员在自编的《延安广播电台进行曲》里所唱的：“我们要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射四方……”是的，我